目　录

任白戈同志谈大革命时期四川地下党的一些历史情况……(1)
张秀熟同志谈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八年中共四川……
　　党组织的革命斗争情况……(18)
刘披云同志回忆在四川地下党工作情况谈话纪要……(40)
“二·一六”惨案简介
　　附“二·一六”惨案死难烈士名单
　　……成都市民政局(55)
“二·一六”惨案三十周年纪念……程子健(59)
回忆“二·一六”惨案与教育经费独立运动……陈平三(65)
“二·一六”惨案始末……傅茂青口述　廖铭吉笔记(80)
成都一九二七到一九二八年间的反劣币运动
　　……成都“二·一六”事件资料收集组(83)
成都“二·一六”惨案与工人斗争……高恩伯(94)
回忆“二·一六”惨案……李保鲁(100)
我所知道“二·一六”惨案中的一些情况……杨达纲(104)
“二·一六”惨案前后的成都省一中……廖友陶(109)
在不断斗争中成长
　　——记袁诗蒧烈士
　　……张秀熟(114)
记老共青团员周尚明同志……沙　汀(123)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回忆李正恩烈士……廖友陶(127)
怀念钱芳祥烈士……廖友陶(129)
张博诗烈士事略……艾宇眉遗稿(132)
回忆张博诗烈士……孔庆一(134)
回忆王向忠同志……邹文奎(137)
王向忠烈士……廖友陶(139)
王道文烈士事略……廖友陶(141)
王道文烈士……李咸宁(144)
忆胡景瑗烈士……廖友陶(146)
回忆苟永芳烈士……王谷(善生)(148)
苟永芳烈士事略……艾宇眉 王曼云 刘天健 李南僧(153)
苟永芳烈士在狱中……丁东(金文达)(161)
"二·一六"惨案调查材料汇集
一、关于"二·一六"惨案的情况……刘披云(167)
二、给成都市文物管理处的复信……贾子群(168)
三、"二·一六"惨案成都大学遇难烈士……
被捕回忆记……苏友农(170)
四、我所知道的"二·一六"惨案……沙 汀(172)
五、冯棣同志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四日来信……(173)
六、舒君实同志谈袁诗荛烈士……(176)
七、陶亮生同志谈袁诗荛烈士……(177)
"二·一六"惨案有关资料汇编
1.省立第一中学被迫离校团启事……(179)
2.省立第一中学校全体职员启事……(179)
3.省一中教职员质问国民党成都市党部函件……(180)
4.成都大学临时学生会恢复上课宣言……(180)
5.成都大学临时学生会请三军部取销通……
缉学生案并敦促张校长复职……(182)
6.国立成都大学校长张澜复职演说……(184)

7.成都大学张澜校长致各军长辞职公函……(185)
8.成都大学临时学生会为军警团联合办……
事处捕杀学生宣言……(187)
9.三军部通令各县查缉杨案在逃学生……(189)
10.军警团联合办事处布告……(190)
11.三军长通电述处置学潮经过……(191)
附录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辑勘误表

任白戈同志谈大革命时期四川地下党的一些历史情况

一九二四年我进南充中学时，校长是张澜，教务长是袁诗荛老师，先前是张秀熟同志。这两位教务长都是当时四川教育界有名的人物，思想进步，办学非常认真，学校办得很有成绩。当时张澜搞地方自治，关于教育、团练、报纸、商会都是地方管，军阀只管征收捐税。因此，学校环境比较自由，各种书报较多，也有些革命书刊。张澜办学讲实用。他在南充中学里还办了各种职业班，有农业班、蚕丝班、工业班、医学班、师范班。南充中学的校歌是这样写的："嘉陵浩荡，果山葱茏，云蒸霞蔚南充。莘莘学子，桃李春浓，巍然建极天中。五月一日，血染腥红，霹雳震惊劳工。从今宇宙，无种国界，群祝大同大同。"（张秀熟同志插话：一九二二年南充中学举行校庆，开学典礼是在四月，我们提议会期改为五月一日，我就拟了这个校歌。）

我上南充中学是读的职业师范班，那时连四年级的中学班已经分成三科了，一科是英算，二科文史地，三科体育美术音乐。这些都准备毕业后当教员的。还有进修班，准备考大学的。一律是四年制。开始办初中班准备按新的学制，分初中高中两级办。（张秀熟同志插话：开中国之未有，一个中学办成一所综合性的大学了。）张澜的侄子张烈，现在南充的张默生，还有成都"二·一六"惨案中牺牲的胡景瑗，都是进修班的学生。罗瑞卿是农业班的，李鸣珂就是农业班的老师，教蚕丝课。医学班又分中医班、西医

班，中医班的主要教师叫张安奇(后来是四川中医学院的院长)。当时川北各县都没有中学，只有南充县有三所中学，即南充县立中学，女子端明中学，顺庆联合中学，因此川北各县要读中学的学生，多到南充或者重庆就读。川北原在遂宁办过第三师范学校。(张秀熟同志插话：孙炳文同志就在遂宁第三师范任教，最早播下革命种子。袁诗荛同志也在第三师范读过书。)我在南充中学读书时，就有一批第三师范毕业的教师如何伯庄、冯全善等，他们在端明女中教书，也在学生中传播了一些进步思想。端明女子中学参加了南充中学的学生会，男女学生之间在每年开会时都有接触，这在当时也是思想开放的一种表现。南充中学一方面订有《晨报》、《中国青年》、《响导》、重庆的《新蜀报》等各种报章杂志，一方面也订有国家主义派的《醒狮报》。不久，张澜被聘去当成都大学的校长。虽然名义上还兼南充中学的校长，实际上没管学校的事。袁诗荛当教务长时间不长，二五年就走了，由王伯安继任教务长，时间也很短，就由张澜介绍到刘湘那里去当秘书长，后来张澜营救张秀熟同志，还可能通过王伯安向刘湘转达他的意思。

我一进校就参加了学生会的工作，因为我考试第一名就当了班长，学生会是各班派代表组成，我因是班长的关系进入学生会。当时学生会比较进步，作了许多事情，如办平民夜校，我在夜校当过教务长。利用寒暑假下乡宣传剪发、放脚等活动。我进校不久就卷入了抗捐运动。当时南充驻军是第五师师长何光烈，是熊克武的残部，他管辖的地盘是很大的，保宁、南部、营山、南充、西充、邻水、蓬安、广安、岳池各县都属何光烈管，他要征收佃当捐，就是佃田当地的租约，都要他盖章收捐才算数。引起农民强烈反对，富农也反对。南充的学生就领头到四乡去打何光烈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出去的收捐专员，打死两个人，惹了大祸。何光烈说打死人要填命，找张澜校长交涉。张澜帮学生打掩护，说这是群众打死的，到底具体是谁打死的，现在还查不出来，答应帮助查。何光烈要审判，张澜说审判可以，就由学生会派代表，派出任启愤和张烈当代表。代表又不是打死人的凶手，能审出什么结果，只不过给何光烈一个体面好下台，结果是不了了之。这件事以后，学生占张澜的势力可厉害了，何光烈部队放假都不在星期天，要和学生假日错开，他们和学生打架是打不赢的，所以叫丘八怕丘九。

一九二四年南充还没有党团组织。一九二五年上半年，党中央派了吴季蟠和黄知风来南充，他二人都是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吴是南充人，黄是营山人，他们住在南充进行革命活动，发展党团组织，黄知风还负责营山的工作，他们表面是组织国民党，实际上主要是组建共产党和青年团。吴季蟠回来后，因任卓宣（又名任启彰）的关系认识任启彰的弟弟任启愤，任启愤又介绍吴认识我，他们开始要我参加国民党。二四年我从任启愤处看到任卓宣从法国寄回的《赤光》杂志，思想已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原来对旧国民党印象不好，也不知道国民党改组的情况，我还不愿意。因为他们要依靠我通过学生会作学生的工作，决定要发展我，我便和他们建立了关系。共产党、青年团组织的建立是在"五卅"以后，那时发展党、团组织，阶级观点并不很明确，在学生中只要品学兼优就行。在手续上和后来发展党员也不同，先是党内规划要发展哪些人，从实际工作中进行观察考验，认为可以了，先组织通过，然后同本人谈话，本人同意就发展，不同意就算了。二五年下半年开学，任启愤找我谈话，问我愿不愿意加入青年团？我说当然愿意，他带我去找吴季蟠，吴对我说：你现在成为

共青团员了，就要遵守铁的纪律，保守党的机密。党的名字叫C·P，团的名字叫C·Y，代名词党叫大学，团叫中学。还交代现在要发展国民党，建立国民党的组织，要我抓学生会的工作，暗地发展共青团。我当时对“铁的”二字没有正确的理解，以为犯了铁的纪律，就象四川的袍哥组织那样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可能要杀人，所以对纪律的遵守是很认真的。一九二五年到二六年，我在南充主要作党、团工作，那时工作量比较大的是作国民党的工作，发展国民党员是比较公开的，开始就和国家主义派发生冲突，国家主义派发展组织在我们之前，教务长杨俊明(成都师大毕业)、学监盛德滋都倾向国家主义派，国家主义派的成员都是地主、资本家的子弟，有钱有势。加上南充中学的国文教师讲课多用古文，国家主义派的《醒狮》报是用古文写的，许多老师、同学都爱读《醒狮》报的古文，所以国家主义派在学校甚为猖狂。国家主义派为了打击我们，就发动一个运动要清查学生会的帐目，目标对准我，要清查“五卅”运动中的支出费用。二五年上半年学生会改选，干事长是邓发光，我是副干事长，实际在学生会当家，积极领导学生会投入了“五卅”运动，下半年邓发光走了，他们不找会计算帐，却要我交帐。我没有理他们，他们就造谣说我贪污学生会会费，想激起群众公愤，把我打下去。这次全靠罗瑞卿解的危。他母亲死得早，在外祖父家长大，外祖父对他管得很严，他的反抗性也大，对旧社会许多不平的事情爱打抱不平。他在学校里是一个不肯读死书的人，爱打球，喜交游，性情豪爽，结交了一批运动员和相好的朋友，力量很大，他参加学生会俱乐部工作非常积极，和我成了朋友。国家主义派要查我的帐，他就挺身而出，在桌子上一拍，大声说：要算帐，找老子来算。手一挽，

个子又高大，做起要打架的样子，那些家伙一见架势就溜了。在最困难的时候，他援助了我，后来我们成了莫逆之交。在和国家主义派的斗争中，逐渐开展了国民党的工作，还成立了县党部，我被选为国民党县党部的执行委员兼青年部长。驻军的两位旅长秦汉三、杜伯乾都被选为县党部的监察委员。

那年还发生了一件事，党派了黄埔军校毕业的李介又名李公凡回南充工作。我们在丝厂开展工人运动，丝厂厂长是盛克勤，是南充所谓的第一流绅士，丝厂的工人要求提高工资，我和李公凡去帮助工人，参加工人方面的谈判，根本还没有谈判，李公凡就拿起手杖打盛克勤，盛克勤就到驻军那里去告状。那时张澜已到成都大学当校长（当时成都师范大学闹学潮，学校开除了一些学生，学生就自动组织起来办大学，成都大学就是这样办起来的，聘请张澜当校长；张虽仍兼南充中学的校长，实际是秦素锋在主持），南充中学就没有以前那么硬了。李公凡打了盛克勤，当时我在场，驻军师长何光烈声称要抓人，加以国家主义派因我在校发展国民党，千方百计要整我，我的处境比较困难。恰好这时何光烈聘请吴玉章同志到南充当嘉陵高中的校长，吴老应聘到了南充，巡视了国民党的工作，又巡视了我党团工作。吴老是四川的名人，一到南充，各学校、军队都请他讲演，工作很忙，需要一个秘书，党组织派我给吴老抄抄写写。后来我给吴老说，我在南充处境困难，已站不住脚了。吴老说不要紧，站不住脚就到重庆去读中法大学。我还告诉吴老，我交不起学费、伙食费也没有。他取出一张大名片（张秀熟：吴老当时叫吴永珊）在上面批写："道融同志：介绍任煜同学来学校，一切食宿由您安排。"道融就是杨伯凯同志，当时在重庆中法大学当教务长，吴老不在校由他负责。

拿了吴老的名片，暑假我就和王义林、王俊超一起到了重庆，我们三人都进了中法大学。王俊超和我是团员。王义林入中法大学后也入了团。那时中法大学只有中学部，教员有肖华清、杨伯凯等，我编在高二班。朱艳清同志亦是中法大学的学生。

二六年暑假，青年团就决定我搞学生会的工作，我名义上是中法大学的学生，实际是取得这个名义以便搞学运工作。那时重庆有两个学生联合会，一是川东学联，一是重庆学联。川东学联会长是张锡畴，还有陶中平（后来叛变了，解放后叫陶季和，在重庆教书）。重庆学联会长是巴中学生熊飞（解放后改名熊文健，在巴蜀中学教书）。我在川东学联任常委，在重庆学联当副会长。二六年下半年开学不久，杨伯凯同志找我谈话，要我转党，当时十八岁就可以转党，那年我已廿岁了。由于工作需要，我就转党了。这时党团组织要开办短期训练班，杨阆公就叫我去负责，大概是要在工作中考验我。训练班结束后，就分配我到重庆共青团地委搞宣传工作。一九二六年下半年，党的书记是杨阆公，组织是冉钧，宣传暂时无人，好象曾诤吾代理了一段时间。是年冬，钟梦侠从上海回来就搞宣传。冉钧还负责工运，程秉渊是搞工运的二把手。共青团的书记是刘成辉，组织是蔡铭钊，宣传是我搞。党团名义上都叫地方执行委员会，实际这个名字是什么时候才正式使用呢？我记得是“三·三一”惨案前，国民党右派对我们大肆污蔑，我们就正式用中国共产党四川地方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四川地方委员会的名义各发表了一个宣言，这两个宣言《四川日报》登了，《新蜀报》没有登，周钦岳在《新蜀报》当编辑，但当不了家，漆南熏是个国民党左派，但胆小，摇摆不定。《四川日报》是牟炼先在那里负责，只要是发去的稿件他都登。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梦侠回来后搞党的宣传工作，他家里开当铺，有钱，西装革履，不会写文章，因此关于报刊文字方面的宣传工作，杨闇公都交给我做。如一九二六年冬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左派）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都是由我作记录，还包括剪裁、整理和发新闻稿。

共青团三个干部，书记刘成辉有家，单独住在夫子池，我和蔡铭钊住在下半城的秘密机关。有天晚上，忘记了关门，我的衣服被盗，第二天起不了床，闇公同志知道了就给我买衣服。后来听说当时他手中也没有钱，是把他夫人赵宗楷的首饰当了，给我买的衣服。闇公同志对人很和气，对干部的爱护是无微不至，他对同志既爱护，也批评。比如有次他在党团的会上作报告，说刘湘和杨森是速成系，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是保定系，军阀之间有派系矛盾，我们如何利用这个矛盾做工作。我当时年轻、不懂事，冒冒失失的，我想这些话对教育下面的同志有好处，就把它整理出来印发下去了。他把我叫去狠狠批评了一顿，他说你根本不懂得形势，这些军阀就真的革命了？他们就是要革命这样讲也不好嘛，给内部少数同志讲的，怎么就通出去了。赶快收回来，这是我受到他最严厉的一次批评。

一九二六年国民党在重庆有两个省党部，一个是左派省党部，在莲花池，实际上是由杨闇公同志领导，出面是李筱亭，其他还有两个老人，吴匡时(吴玉章的哥哥)和邓懋修(邓颖刚的父亲)。国民党右派省党部在总土地。左派省党部十一月在重庆召开代表大会，从二十五日起，开了十几天。会上杨闇公把我分在秘书处，负责纪录和发布新闻。冬天一个时期，国民党甘乃光组织青年工作委员会，省党部由吴匡时作青委会主任，我被派去作秘书，所以经常到莲花池。

一九二六年冬，我主要搞团的宣传，领导学生运动。以前当过团的城外部委书记，就是通远门以外的学校，包括中法大学、高工、高农、联中、美专等七、八个学校。

二六年下半年，中央通知派一些人到莫斯科学习。杨闇公考虑过派我去，我也表示愿意去学习，但工作走不开也就改派张锡畴去。二六年冬，党中央以国民党名义派人到重庆，招考黄埔军校第六期（武汉分校）学生，只派了一个主任陈维生来重庆，考试官都在重庆找，主要是川东师范和中法大学教师组成的，记得有肖华清、陈志中。党中央同时又来了一个指示，在招考工作中，要防止国家主义派和孙文主义学会混入学生队，必须加强政审，还要有人负责介绍，杨闇公同志指定我掌握政治审查。这时罗瑞卿同志跑到重庆来要求参加革命，我就帮助罗瑞卿考进了黄埔军校。中法大学考去了一批人，有徐彦刚、张锡龙等，成都大学的李正恩也考上，因工作需要，刘愿安不让他去。后来听罗瑞卿说，徐、张在红军中都当过高级指挥员，在战斗中牺牲了。还有几个女的，有游曦（中法大学学生）在广州暴动中牺牲、童幼芝（亦是中法大学生，现尚在合川）、胡兰畦（现在成都）。

一九二四年吴玉章、杨闇公同志在成都成立了青年共产党叫Y·C，还发行《赤心评论》刊物。后来吴玉章，杨闇公正式加入了党，其他那批人自成一个团体，我们称它为赤心评论派。一九二六年国民党（左派）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重庆开会时，赤心评论社要求入党，双方在重庆谈判，杨闇公指定刘愿安和杨伯凯作我党的代表，后来，杨伯凯同志因事抽不开身，就由我参加赤心评论社是傅双无、吕寒潭参加，他们坚持集体入党，我们只同意个别申请入党，谈判不成，只好放一下再说。反正国民革命

大家要合作，所以在成都方面，国民党市党部只搞一个，出面的事他们干，实际工作由我们作。他们搞了一个工会，我们也搞了一个。原来在成都有两个工会合不拢来，还是各搞各的，但要好好合作。锺善辅、刘亚雄、李宗林等同志就是我党在成都搞工会工作的。

当时，四川军阀迫于武汉政府的形势，纷纷要求易帜。蒋介石委了几个军长，杨森为二十军军长，刘湘为二十一军军长，赖心辉为二十二军军长，邓锡侯为二十八军军长，刘文辉为二十四军军长，田颂尧为二十九军军长，刘甫九为二十三军军长。刘湘盘据重庆，杨森驻在万县，从江北、长寿、涪陵直到夔门、奉节，都属杨森的防地。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驻在成都，川西、川北、东南大部分地区，都是他们的防地。这时党中央派了一批黄埔生到四川加强军队，胡陈杰、傅炳勋（郭汝栋的妹夫）和郭汝瑰（郭汝栋的兄弟）都到了涪陵郭汝栋那里，李伯渠、穆欧仁派到万县。这时，我们还向军队派了一些政治部主任，如吴超然派到罗仪三师，尹绍舟派到郭汝栋师，黄知风派到向时俊师去当政治部主任，朱德同志到杨森部当党代表。有些学校也派了人去，李嘉仲派到万县第四师范当校长，陈志中到二女师当校长。许多学校的校长都换了人。以后国民党反共，有的政治部主任就跟着跑，真的当国民党部队的政治部主任去了。这里要说明一下南充的吴季蟠是怎么回事，他原是共产党南充县的负责人，出面是用国民党县党部书记的名义，蒋介石"四·一二"叛变后，他还在南充组织国民党，他的兄弟是国民党右派，他算是国民党左派，他没有自首，也没有出卖同志，是他兄弟把他杀掉的，出的布告是以共产党论罪，从表面现象看，他是烈士，其实在国共分裂后，还要作国

民党的县党部的书记，显然不是为党牺牲的。

一九二六年刘伯承同志领导顺泸起义，派了一批黄埔生去，中法大学也派了一批学生去，如童功懋、戴育生等在战斗中表现很好。黄慕颜也参加了顺泸起义，他是黄隐的兄弟。四川有些军阀换了青天白日旗，打的国民党的牌子，本质上还是反革命，顺泸起义以后，就看清楚了，邓锡侯赶快派兵占领南充，刘文辉派兵攻打泸州，但杨闇公还是争取对这些人作工作，刘、邓还派有人在重庆。真正和我们靠拢的是黄慕颜、秦汉三、杜伯乾、向时俊和郭勋祺，郭在大革命时期叫郭勋，是青年军官，表现还不错，后来“剿共”就反动了，是刘湘的模范师师长。二七年蒋介石派了三个人在四川作策反工作，就是卢锡卿、向育仁、李仲公（贵州人），李回到贵州，卢在重庆，向到成都。卢锡卿在重庆搞两面派，表面上拥护莲花池省党部，实际和总土地党部搅在一起，总土地主要是国民党右派石青阳等搞的。三月十二日在夫子池召开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大会，矛盾开始激化，杨闇公作讲演，卢锡卿也在会上讲演，他公开攻击共产党，说现在有些人要篡夺我们的党权。杨闇公同志针锋相对地予以驳斥说，我们党内有些人想搞分裂，引导到反革命方向去。我问杨闇公“卢锡卿这个讲演登不登报”，杨说登出去好。

顺泸兵变后，赖心辉在重庆成了没有军队的光杆司令，他的二十二军军部的牌子，只好挂在刘湘处。刘湘举行二十一军军长就职典礼时，把赖心辉挂上去（张秀熟：十二月二十九日刘湘和赖心辉同时在重庆宣布就职，赖心辉十一月在宜昌发表申明）。夏斗寅进攻武汉时，杨森带兵出川。党已准备转入地下斗争，估计到形势一变，四川军阀要向共产党人开刀，但也估计到四川军阀之

间互相有矛盾，还需进一步观察和做工作。刘湘就职以后设宴请我们吃饭，杨闇公是主客，还请了工会、学生会的代表，据说那次请客就准备一网打尽，因为形势还没有完全变，所以没下手。

一九二六年，许多县都建立了党团组织，党组织比较强的有綦江、江津、巴县、江北、涪陵、长寿、内江、合江、泸州、宜宾等地。当时党的负责人是：

内江：黎冠英

宜宾：郑佑之、郑则龙

南充：吴季蟠

营山：黄知风（后来是郭经阶）

邻水：陈俊三

綦江：陈翰屏

合江：王旭生

江津：戴维汉

在国民党开代表大会期间，我们共产党员在老君庙开了一个九县团总的联席会议，九县联团的负责人是涪陵李蔚如。

一九二七年三月，为声援南京惨案，决定于三月三十一日在重庆打枪坝召开群众大会，会场中间设总主席团，四角设分主席团。一切准备就绪，通知也发了。开大会的前夕，有人给杨闇公通消息说，刘湘要在开会时下毒手屠杀。已经是半夜了，闇公把我们找去开会，出席的有冉钧、钟梦侠、刘成辉、蔡铭钊和我，还有程志筠、陈仲苍两位党和团的妇委书记。在程志筠住的党的秘密机关开了个紧急会议，研究怎么办？首先研究讨论大会还开不开？当时主要考虑通知都发出去了，群众都准备了，临时共产党不到会影响不好，宁肯牺牲，也要参加，于是决定明天的大会

照开。后来又讨论会场如何警戒，闇公说找向时俊带卫队去会场维持秩序。并决定由共青团组织童子军，把绳子、棒棒带起，作会场外围的警戒。参加会议的人都要整队入场，不许闲杂人混进去，会场警戒是很严密的。刘湘派的便衣没能闯进去。会议正开始，门口就有人打枪，一打枪群众就慌乱了，童子军也挡不住。我在主席台上当记录，会场一乱闇公跟着向时俊等退出会场，当天向时俊是带了卫队去的。当时打死了许多人，陈达三、漆树芬就是当场打死的。我是从城墙上跳下去的，我们许多人都作了牺牲的准备，程仲苍、陈志筠都把自己的姓名、出生年月写好放在包包里，我也是把好衣服穿上的。我从城墙跳下去后，就跑到江北何祝嵩家，吃了晚饭，又跑回重庆。第二天一早就到刘成辉家，冉钧同志也到了那里。我们三人一起商量决定首先要设法找到闇公。冉钧平时住在关帝庙总工会办公，他在重庆工作时间久，是外交后援会主席、工会主席，认识他的人多。那天他从夫子池出来转拐走到天主堂街，就被刘湘放出来的便衣凶手一枪打死了，我是亲眼看见的，赶快转个弯从天主堂巷子跑了。第二天晚上闇公找到我们，在他夫人娘家赵家开会，有我、刘成辉、钟梦侠。闇公说他要到武汉去向中央请示、报告，要我们作善后工作。闇公很瘦，他化装成一个老太婆，有他家里的几个妇女送他上船。刘湘早已派人侦查他的动向，上船后，就被那些侦探特务查看出来，当时逮捕了。我们从程志筠同志那里知道闇公被捕的消息，至于闇公被害，我们不知道，是在报上登出来才知道的。

“三·三一”惨案后，大家纷纷逃散，中法大学、中山中学完全被反动派打垮了，巴县国民师范、川东师范等几所比较红的学校，我们的党团员和左派学生不敢回校，连铺盖都没卷走就跑

了。《新蜀报》、《四川日报》也被打垮。党团地委的几个领导人只剩下钟梦侠、刘成辉、蔡铭钊和我四个，他们三个都想朝武汉跑，但重庆需要人作善后工作，清查死难同志，他们三个就推我作党、团临时特委书记，他们就跑了，工作由我来担负。开始我思想不通，认为钟梦侠二六年冬才回重庆，和学生方面没有接触，他的家庭也是个很好的掩护条件，党的负责同志死了两个，只剩下他一个，正应该留下。共青团刘成辉是书记，怎么把我这个负宣传工作的留下来了，虽然思想不通，但组织服从，我还是担任了临时的特委书记。只是我在重庆只能昼伏夜出，行动受限制。大家议定詹正圣给我作助手，他才从上海回来，认识他的人不多，黄中元作交通。我在重庆呆了两个多月，先住在钟梦侠家，后来发觉有问题，我又搬到陕西街钟家的当铺去住了几天，接着住在黄中元姐姐家，就是傅烈同志他们在兴隆巷开会被捕的那个房子。我在重庆把一些失散的同志找到了，恢复了一些基层组织，决定到涪陵去发动郭汝栋部队打刘湘。我到涪陵是黄知风（向时俊部政治部主任）的帮助把我送出城的，当时还有陈仲苍（团妇委书记）、汪海若（市妇联负责人）两个女同志，也要离开重庆。黄知风派了三乘杠杆轿子，她们梳装打扮成两个军阀太太，说是向时俊部队军官的家属，我扮成副官，就这样混出了城，然后护送我们从江北到长寿，向时俊住长寿的一个团长王炳南，又派船把我们送到涪陵。当时涪陵驻军郭汝栋表现倾向革命，我们还派了傅炳勋、胡陈杰等许多黄埔毕业生在那里工作，认为可以利用四川军阀来打刘湘，另方面，李蔚如在四镇乡还掌握了一些武装，涪陵呆不住还可以到李蔚如那里去，这是当时对形势估计不足。后来李蔚如上了郭汝栋的当。郭是李蔚如的学生，他以商议共同御刘（刘

湘）为由，诱骗李蔚如去同乐镇开会，结果李一去就被郭绑送给刘湘，并把尹绍舟礼送出境。我在涪陵住了一段时间，发动郭汝栋打刘湘的事不行，当时年轻幼稚，不知该怎么办？跑武汉不对，回重庆不行，我就和裴紫琚一道背起包袱经邻水、广安、岳池、安岳、乐至、资中、简阳到了成都，找到刘愿安同志。刘愿安是川西方面党的负责人，在一九二六年冬开国民党（左派）第一次省代表大会时我认识他，觉得他很有才干。刘愿安住黄瓦街，李宗林同志当交通，我就把重庆方面的情况向刘汇报，刘也把成都的情况讲了，我问重庆方面怎么办？刘说没办法，只有等中央指示。他问我给中央打过报告没有？我说打过两次报告。中央的通信处是武汉长江书店屈楚豪，重庆党组织的代名，"三·三一"以前叫慧英，下盖"人杰"的印章。团组织的代名叫余一民，我在特委期间取的名字叫石光第。刘愿安说，先把川西的工作搞起来，我管党的工作，你管团的工作。那时成都的学校很多，每个学校都有团的组织，党的组织少一些。我记得郫县、彭县、安县有党的组织。我们在刘文辉邓锡侯的部队里亦有些党组织的活动。旷继勋就是那个时候入的党。傅烈来川后在重庆，是中央派来的省委书记，同时派彭兴道作团省委书记。刘披云同志派来成都负责川西特委的工作，把刘愿安调去重庆参加省委领导。彭兴道作团委书记后，本应找我这个原来负团的责任的人联系商量，参加团的领导工作，他反而有意排斥我、压我。因为彭在苏联学习时，他爱人汪海若在重庆搞妇联工作，经常和我发生工作联系，彭兴道回国后听别人说我和汪的关系密切，就把我当作仇敌，一方面要求省委将我留在青年团工作，一方面又降低我的职务，把我分配到共青团川西特委搞组织，把省立第一师范的学生周尚明提为特委书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